



钱钟书的“十六字真言”

1948年,钱钟书出版《谈艺录》,在“序”中写有这样一句话:“东海西海,心理攸同;南学北学,道术未裂。”人们往往称这句话为“十六字真言”。

私下以为,其中的“东海西海”,有可能是借用先秦古籍《山海经》中的“南北东西四海”的说法。“南学北学”有可能是借用唐人对魏晋南北朝期间经学分南北的评价,即“南学简约,得其精华;北学深芜,穷其枝叶”。“道术未裂”或源于《庄子·天下》中的一段话:“是故内圣外王之道,暗而不明,郁而不发,天下之人各为其所欲焉以自为方。悲夫!百家往而不反,必不合矣!后世之学者,不幸不见天地之纯,古人之大体。道术将为天下裂。”睿智的钱钟书以颠覆性的手段,从中化出掷地有声的四个字“道术未裂”。至于“心理”二字,抑或滥觞于南朝梁代刘勰《文心雕龙·情采》中的“是以联辞结采,将欲明理;采滥辞诡,则心理愈翳”。明人王守仁《传习录》中的“此区区心理合一之体,知行并进之功,所以异於后世者,正在於是”。近人苏曼殊《断鸿零雁记》第十二章中的“世人心理如是,安得不江河日下耶”。当然也不排除与弗洛伊德著作英译本中的psychology即“心理”有所瓜葛,毕竟钱先生留学英法诸国经年,对弗洛伊德早就耳熟能详。

这些古人乃至洋人使用过的字眼,被钱钟书顺手拈来之后,加以重新组装,成“十六字真言”,被赋予了崭新的含义,金光闪亮,字字千钧。对此“真言”,不妨作这样的解读:古代人和现代人、中国人和西方人,其心理思维状况,在不少情形下都是“心有灵犀一点通”;古时的学术和现今的学术、中国的学术和西方的学术,其原理、方法,在许多状

况中都是千丝万缕紧相连,涓涓细流归大海。正是基于这样的背景,钱钟书运用“打通”的策略,“以中国文学与外国文学打通,以中国诗论文词曲与小说打通”,从而“拈出新意”(钱钟书1979年致郑朝宗语)。

拜读钱先生的《谈艺录》《管锥编》可以发现,他穿越时空的长途跋涉,可谓处处锦绣,步步莲花。且以《谈艺录》第六则“神韵”为例,钱先生首先以自己推行出来的一种理念,即“无神韵,非好诗;而只讲有神韵,恐并不能成诗”作为发题,然后引《易经》《孟子》《庄子》《文子》,以及汉人王充《论衡》、南北朝人刘勰《文心雕龙》、唐人殷璠《河岳英灵集》、唐人司空图《与王驾评诗》、宋人严羽《沧浪诗话·诗辨》、宋人陆游《与儿辈论文章偶成》、宋人晁迥《法藏碎金录》、明人胡应麟《诗薮》、明人陆时雍《古诗镜》、清人王士禛《池北偶谈》、清人翁方纲《复初斋文集》、清人姚范《援鹑堂笔记》、清人姚鼐《古文辞类纂》等中的相关说法予以佐证。意犹未尽的钱先生甚至还从自己的记忆库中抽出古罗马哲学家普洛丁(Plotinus)、古罗马诗人卢克莱修(Lucretius)、欧洲中世纪思想家波爱修斯(Boethius)、英国唯美主义理论家佩特(Pater)、法国哲学家柏格森(Bergson)、法国文艺理论家白瑞蒙(Bremond)、法国诗人克洛岱尔(Claudé)、德国神秘学家爱克哈特(Eckhard)、德国心理学家洛采(Lotze)、德国哲学家雅科比(Jacobi)、美国诗人庞德(Pound)等人的类似论述予以印证。通过这一番披奇揽秀,钱先生的结论是:关于这个题目的种种古今中西之说无不相互“吻合”,丝毫不悖“好诗必定有神韵。仅有神韵难为诗”的理念。

来源:中华读书报

老红军留下传家宝

在江西省宁都县已故老红军谢勤的家中,有三件传家宝:一把油纸伞,这把伞呈红色,红漆有些脱落,伞柄底部刻着“黄公略”3个草书字;一个针筒,包浆厚,黑中透亮,筒身刻着“不拿人家一针一线”8个字;一个苎布眼镜袋,袋体变黑,布满沧桑。

谢勤(1912—1993),宁都县黄陂杨依村人。1928年参加革命,曾被派往乐安县进行宣传工作;1931年冬,任宁都县少共青塘区委宣传部长;1932年5月,任少共青塘区委书记;新中国成立之初,任宁都黄陂区工商联主任。十余年后,他怀着不为政府增加负担的朴素想法,辞去公职,成为一名普通农民。这三件物品都是他的遗物,其中的油纸伞和针筒,记录了他与黄公略的情谊。

黄公略是井冈山斗争时期“三骁将”之一,时任中国工农红军第三军军长。他指挥的红三军在中央苏区第一至第三次反“围剿”中,执行诱敌深入的战略方针,英勇作战,屡建战功。

1931年,19岁的谢勤带领村中32名青壮年参加了黄公略领导的红三军。黄公略见他这个小伙子竟带来这么多人参军,非常高兴,于是亲切地跟他聊天,还帮他原来的名字“苎狗”改为“谢勤”。见谢勤聪明能干有文化,黄公略便让他在军部从事文书工作。谢勤充分发挥自己的文化特长,教红军战士识字,书写标语口号,宣传红军的政策等。勤奋好学的谢勤,还在部队拜吴弼、谢水石为师,学会了画画、刻印。看着谢勤的进步,黄公略很高兴。

黄公略生活俭朴,穿衣服都带补丁。一次,谢勤看到黄公略的衣服破了,便到老乡家中借来针线补好,后来竟忘记把针线还给老乡。黄公略知道后很生气,批评谢勤说:“红军的‘三大纪律六项注意’第五条规定,‘借东西要还’,你倒好,借了老乡的东西不还,影响多不好!”谢勤忙说:“我去把针线还给老乡。”黄公略说:“部队开拔已离老乡居住地一百多里,还是以后找机会还吧,可一定要记得。”

此后,谢勤一直没机会回到那个驻扎地,那针筒也一直带在身边。他特意在针筒上刻了“不拿人家一针一线”8个字,时刻告诫自己,不要丢了红军的优良传统。

长期的行军打仗,谢勤的身体因受伤而衰弱不堪。为了不拖累部队,谢勤便向部队请假,回家治病。离开前,谢勤来向黄公略告别。黄公略握着谢勤的手说:“谢老表,你要走了,我也没有什么送你,我身边只有这把油纸伞,它陪伴我参加革命,风里来雨里去,现在送给你,望你安心治病,治好病早早归队。”

谢勤接过油纸伞,紧紧抱在胸前,激动地说:“黄军长,我一定听您的话,治好病继续革命!”谁知,这一别竟成永别——1931年9月15日,黄公略率部参加方石岭之战,在指挥部队转移途中,于吉安东固六渡坳遭敌机袭击,身中数弹,壮烈牺牲,时年33岁。这把伞也成了寄托谢勤对黄公略思念之物,一直保留下来。

来源:中国纪检监察报

鲁迅心爱的“藏书图记”到底是什么宝物?

文学家、思想家、中国现代文学奠基人之一……除了这些耳熟能详的名号,鲁迅还有一个称号,即“现代新兴木刻之父”,他生前自费编印木刻画册十余种,印行近万册。

在这些画册中有一本《引玉集》,编印于1934年,收录了59幅鲁迅以三闲书屋的名义、用宣纸换来的苏联单幅与插图木刻。其中有一张毕斯凯莱夫所作的“国立美术馆图书室”,被鲁迅称为“藏书图记”。

这“国立美术馆图书室”其实就是一枚藏书票。

所谓藏书票,可理解为小型版画。受到在版画界地位的影响,藏书票界往往也把鲁迅奉为祖师。

鲁迅在其日记和书信中曾三次提到藏书票:1930年,鲁迅在日记里写到自己曾到内山书店购买日本书票艺术家斋藤昌三的专著《藏书票之话》;1936年3月23日两次提到“藏书票”,均因唐英伟在去信言及赠送十张藏书票事项。在1934年至1936年间,鲁迅曾经收藏了李桦、唐英伟等现代版画会同人创作的藏书票24枚,而这24枚书票现已成为中国书票史上极其珍贵的艺术史料。

1936年,鲁迅扶病参观“第二回全国木刻流动展览会”,与木刻青年热切对谈。摄影家沙飞拍下这珍贵镜头……

既然如此,鲁迅为什么要在《引玉集》中特意将藏书票特意称为藏书图记呢?据猜测,这或许与素来不和的叶灵凤有些许关系。叶灵凤也是一位收藏藏书票的大家。他不仅和鲁迅几乎在同一时期购买了《藏书票之话》,更与作者斋藤昌三保持通信,交流、交换藏书票:早在1933年,叶灵凤便自己设计刻制了一枚以凤凰为图案的藏书票;且在1933、1934年间,于《现代》、《万象》、《文艺画报》发表三篇文章推介藏书票其物。

对于同鲁迅的关系,叶灵凤曾撰文《献给鲁迅先生》述之:我和鲁迅之间,说来古怪,这是他人所不易看出的,好像有一点冲突,同时又有一点契合。我有一个弱点,喜欢买一点有插图的书和画集放在家里看看,这弱点,他老先生好像也有……近年偶尔遇见,他老先生虽然“丰采依然”,可我早已唇不红,齿不白,头发也不光了。我以为早已各捐旧嫌,你印你的木刻,我玩我的藏书票,两不相犯,谁知读了《花边文学》,才知道“天长地久有时尽,此恨绵绵无绝期”,倒使我又要担心起来了。既然鲁迅《引玉集》出版于1934年,那么在时间脉络上刚好与叶灵凤的发文时间有所重合,故而大家猜测,鲁迅或许是为了避其锋芒,才将藏书票换一种称呼——作“藏书图记”的。

很多著名画家都会参与藏书票的创作,如马狄斯、高更、毕加索等,而文学家们则积极使用它们,如福楼拜、雨果、海明威等,使得藏书票成为一种文化。20世纪30年代,藏书票传入中国,除了鲁迅与叶灵凤两位先生,其他文人大家诸如郁达夫、唐弢、郑振铎、臧克家等亦对藏书票情有独钟。

来源:中国作家网

1948年,钱钟书出版《谈艺录》,在“序”中写有这样一句话:“东海西海,心理攸同;南学北学,道术未裂。”人们往往称这句话为“十六字真言”。

文学家、思想家、中国现代文学奠基人之一……除了这些耳熟能详的名号,鲁迅还有一个称号,即“现代新兴木刻之父”,他生前自费编印木刻画册十余种,印行近万册。

在江西省宁都县已故老红军谢勤的家中,有三件传家宝:一把油纸伞,这把伞呈红色,红漆有些脱落,伞柄底部刻着“黄公略”3个草书字;一个针筒,包浆厚,黑中透亮,筒身刻着“不拿人家一针一线”8个字;一个苎布眼镜袋,袋体变黑,布满沧桑。